

1012

無錫文史資料

第39輯



79994

江苏省无锡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沉痛悼念钱钟书先生逝世

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

- 送别钱钟书先生 李慎之 (1)
- 重因风雅惜 匪特痛吾私
- 追念我的老师钱钟书先生 朱锡沅 (8)
- 暨南听钱钟书先生课追忆 章学良 (13)
- 钱钟书先生给我复信的缘起 唐原道 (16)
- 钱钟书先生传略 本刊资料室 (19)

纪念唐星海先生百年诞辰

- 弘扬唐星海先生的爱国敬业精神 缪根宝 (23)
- 纪念我的父亲唐星海 唐骥千 (26)
- 雄才大略 精明能干
- 纪念唐星海先生百年诞辰 海 笑 (29)
- 唐星海传略 唐齐千 (33)
- 开明实业家唐星海 席闻史 (38)
- 忆在庆丰从事技术工作 吕师尧 (40)

戊戌变法百年祭

- 薛福成:最早动议“变法”者之一 王赓唐 (44)
- 推动变法 举荐人才
- 戊戌变法中的徐致靖 顾一群 (49)
- 从科技救国到政治变革
- 徐建寅与戊戌推新 叶 勤 (57)
- 埃实学堂与近代无锡教育变革 朱邦华 (60)

30年代的农村调查

陈翰笙 (63)

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	翟文(71)
我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总结	薛暮桥(74)
一生研究经济的薛暮桥	支廖(81)
坚持真理的孙冶方	支廖(87)
当代经济学家姜君辰	姜宣(93)
勤奋的学者 忠诚的战士	
——回忆钱俊瑞同志	薛暮桥 秦柳方等(99)
经济学家秦柳方传略	闻思(107)
张锡昌与《中国工业》	汤健民(110)
张锡昌与《广西日报》(昭平版)	周谷年(114)
在美奔波五十年	[美籍]邵品刻(125)
国家派我访问新加坡	支允成(130)
教坛耕耘六十春	
——记阴景曙先生执教60年	刘大卫(133)
三生不改丹青志	吴雨苍(141)
乒坛名将蔡振华的成长之路	薛可达(148)
李正与太湖仙岛	文史(153)
复旦两次迁校无锡纪事	孙宏年(159)
无锡电视台的创建	孙永绥(166)
无锡的卖梨膏糖业	钱惠荣(174)
苏南区域物产交流展览会追忆	邓新诚(178)
无锡粮食堆栈业往事忆记	杨嘉谷(183)
过海如与“三阳南北货店”	华振范(203)
无锡第一个自来水厂	贡庸(207)
吴语趣谈(一)	许紫楠(211)

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

——送别钱钟书先生

(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

李慎之

钱钟书先生走了，悄悄地走了。

他住院已经整整四年又三个月了，不但入院后就没有出来，而且也没有下过床。上个月刚过八十八岁的生日，如此高龄而又久病，走得也不能算是意外，但是我却总觉得想不到。

我自从一年半以前中风以后，不良于行，这期间一共也只去过他两次。他人实在是消瘦得厉害，但是眼光却还像以前一样明亮，看见我只是眨眨眼睛，并不说话，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是明白的，但是疾病长期的折磨，连开口的气力也没有了。眼看年关将到，我正寻思再去探望一回，不料竟传来了他逝世的消息，真是没有想到。

没有能赶上见最后一面，总算赶上了第三天在八宝山举行的火化仪式。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叫做仪式，因为遗体只是在八宝山的第二告别室停放了二十多分钟，在场的也只有相伴了他一辈子的杨绛先生和几个亲属，社科院的一两个领导人和几个办事人员，一共只有十来个人，偌大的告别室，空荡荡的，没有松柏，没有鲜花，更没有花圈和挽联，甚至没有照片。杨绛先生领着大家鞠了三个躬，遗体就推到火化室去了。遗体一直盖着白布，上面洒着玫瑰花瓣，连头都蒙着，我还是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

事情来得匆忙，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一直到了八宝山，才买了一个装着白菊花的花篮。想写一副挽联别在上面，临时想不出词儿来，凑了两句“万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师”，可能是陈三立诗里的句子，虽然文字拙直，但是钱先生是当得起的。

第二天一早，又因为《胡绳全书》出版，我应邀参加发行式，那可真是冠盖云集，社科院大院里都叫小汽车给塞满了。而且因为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从大门、二门到三门，都设了岗卫，我不知怎么忽然对昨天的告别有一种凄凉的感觉，但是马上又觉得我的想法实在有点亵渎钱先生。钱先生一生寂寞，现在“质本洁来还洁去”。最后连骨灰都不留，任凭火葬场去处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自己的选择是他一生逻辑发展的自然结论。钱先生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人。

钱先生和我是世交，他的尊大人子泉先生和先君柏森公是朋友，因此我从小就能听到夸他读书如何颖悟，小小年纪就能代父亲司笔札、做应酬诗这些话。子泉先生是我们家乡的文豪，我们上初中时就读过他的《无锡公园记》的。因此每当听父亲说“你们应当学钟书”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惊异钦羡之感。但是我真正认识他，已到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了。那时他同他的双胞胎叔父孙卿先生同住在上海辣斐德路。他的堂弟钟汉、钟毅、钟鲁、钟彭，或是我的中学老师，或是我的中学同学，关系十分亲密，因此我常去他家。那时往往可以在客厅里看到一位戴黑边眼镜，穿着深色西服，人字呢大衣，望之俨然的人，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大哥钟书，我当然是不敢通问的。三十年后在北京熟识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十分随和而且极富于幽默感的人。不过，如果说“学习”，那么，以我之鲁钝，不但办不到，而且是根本不敢想的。

一九四六年，我从重庆到上海，参与始终没有能开张的新华日报总社的筹备工作，这时从《清明》杂志上读到《围城》，说实在的，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给了我深刻的印象的是书名起得

十分谦虚的《管锥编》。如此一部百万言的钜著，开始写的时候，钱先生夫妇虽然已经从干校回来了，但是还没有住处，只好住在学部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写这样博学的著作，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是孤例。但是更难得的是，这书是在仍然险恶的政治空气下写的。当时，文革还未结束，钱先生就敢写那些与“三忠子，四无限”毫无关系，只有“封建余孽”才写得出来的书。不但胆识惊人，而且远见洞察实非常人可及。虽然还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他已经算定严冬即将过去，春天不久就要来了。

因此，一九七九年我看完四卷《管锥编》后，就去向他祝贺，特别钦佩他“自说自话”，无一趋时语，他只是淡淡一笑，摇摇手说“天机不可泄漏”。

钱先生在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的小引里自称是个“懦怯鬼”，但是世人现在钦佩《管锥编》是含英咀华的经典之作之余，也不应该忘了它曾是一朵预告寒尽春来的报春花。多少封笔多年的老先生就是在它的鼓舞下才又敢伸纸濡笔，重理旧业的。

《管锥编》出版以后，钱先生这才“声名从兹大，汨没一朝伸”。但是他还是守素抱朴，闭门著述。在八十年代又增补了他四十年代的旧作《谈艺录》。同青年时期一样旁征博引，阐幽发微，使篇幅扩大了一倍。

据为《管锥编》和《谈艺录》查对材料的同志们告诉我，该书引文书籍多达两千余种，还不包括许多现在在中国无处找到原文的西洋典籍在内，引文几乎没有什么错误。钱先生的记忆力真是不可思议。我有幸熟识他的好几位清华同学，都是当代中国的一时之选，对钱先生的才气都是交口称赞无异辞。乔冠华就不止一次对我说过：“钟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 photographic memory。”胡乔木则说，“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但是他一忽儿法文，一忽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实在听不懂。”其实，我

也是一样，可是他还时不时说“你当然知道……”，愚陋如我，那里懂得他说的是什么，只好傻笑作理解状。费孝通先生跟他是同年好友，最近还曾跟我说他父亲是清朝最末一科的秀才，母亲是中国第一个幼稚园的园长，但是自己受的就是新式的，也就是西式教育了。上一代的人要引用传统古籍，就像打开自来水龙头一样自然流出来。而到他这一代，要引一句诗云子曰，就要翻半天书，还找不着。我说你们这一代还有一个钱钟书，他说那是特例，不能算是我们这代人的代表。事实上，记诵广博如钱先生，家里却几乎没有藏书。他看过的书盈千累万，都是记在脑子里的。

我曾问过钱先生，我也读过不少诗，可是除了《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能记得住题目外，其他的就算背得滚瓜烂熟，题目也总是记不住。他怎么能把那些奥僻冗长的题目都记住呢？他告诉我，他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是教过宣统皇帝的庄士敦，曾对他的论文提出过批评，说是引据不全，又不是原始出典。他说“我以前那里懂得这个，以后就注意了”。但是，说实在话，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注意了，也无论怎么样都学不会的。

从八宝山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中国，甚至世界，又要过多少年才能出这么一个博闻强记的头脑，这么一个聪明智慧的头脑呢？

钱先生性格开朗，有时也是口没遮拦的人。就他的作品而论，出版在六十年代的《宋诗选注》，就可以说是一个特出的例子。当时，我是头上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看到他在注语里偶尔爆发的“奇谈怪论”，真是有为他捏一把汗的担心。据乔冠华告诉我，他认为那是那年头唯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我也一直怀疑五十年代就一直有些“不良言论”在社会上流传的钟书，何以竟能躲过五七年的大劫。有一次，我问他，他又不信佛教，为何对宗门语录如此熟悉。他说，那是为了破执，破我执，破人执，破法执。他后来又说：“I never commit myself”。我想也许这就是对我心中的问题的答复了。

钱先生的诗，我最爱的是“凋疏亲故添情重，落寞声名免谤增”一联。据在清华低他一班的同学施谷告诉我，钟书当年在清华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敛手称扬。如此少年高名，出国回来就破格当上了西南联大的教授，但是到解放以后，就深自谦抑，远避名利。三十年间，在中国大陆几乎无人知道钱钟书的名字。同学少年当了大官的，他从来不去串门，到了晚年都是别人去看他，他则只是到别人弥留之际才去医院探望一下，以尽年轻时的交情。

改革开放以后，他的书能够出版了，收入自然多了一些，然而在此以前光凭他一级研究员的工资实在也谈不上富裕，他却总是暗地里资助一些生活困难的同事或者学生。不但施不望报，而且力避人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和陈寅恪先生一样，钱先生虽然躲过了五七年这一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却无论如何是躲不过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是不能不带的。汝信同志屡次告诉我，有一次，学部猛斗牛鬼蛇神，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唯独钱先生却顶着活无常式的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有大×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从贡院前街走回千面胡同的宿舍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这只有“有待于内，无待于外”的人才能做得到。我在那时也有过被斗的经验，然而却决没有这样的气度。钱先生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小引，说其实还漏了一记——“运动记愧”。我想这篇文章其实是应该由全中国人来做的，中国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国这一段的国耻的。

钟书先生典籍精熟，许多人都以为他非三坟五典不观，这又是一大误会。其实他十分关心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潮，不但包括文学，而且及于哲学，甚至史学。伦敦《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什么时新玩意儿，都逃不过他的视线。

八十年代初，中国流行的是向南斯拉夫取经，实践学派正在走

红，我去请教钱先生，他不但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送了我一本《PRAXIS》。前几年中国兴起了解释学。奇怪，我那八卷本的哲学大百科全书，竟然没有 hermaneutics 这个辞条。他又告诉我“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这就是解释学”，使我茅塞顿开。

关于后现代主义，我看他知道的也不会比别人少，不过他总是能在有人故立新说的地方看出其实前贤早有成说，花样翻新，未必尖新可喜，有的还甚至窒碍不通。顺便说一句，现在的时髦青年老爱挂在嘴边的“解构”（deconstruct）一辞原来还是钱先生应别人之请翻译的。他的知识园新鲜一如其渊博。

我这个人思想懒，笔头更懒。与钱先生对话，虽然他咳吐珠玉，我却未能追记，一任其随风飘落，现在已追悔无及了。

自从海通以还，中国知识分子就以学贯中西竞高争胜。确也出了一批大师。但是三个月前，杜维明先生就同我慨叹，真正学贯中西的人物大概已经没有了。有之，钱先生是最后的一人。钱先生有一次曾对我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环顾域中，今日还有谁能作此言，敢作此言？

近二十年来，学术界有一股奇怪的风气，就是贬洋排西，好像非要振大汉之天声而后快。在这中间，钱先生是非常清醒而冷静的一个。他的名言：“东海四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关于世界文学的话后先辉映，实际上是未来的文化全球化的先声。

因为钱先生历来认为朝市之学必成俗学，有不少后生把他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是对人民的关怀与对祖国的关怀，一直在熬煎着他的心。

九年前的夏天，我去看他，他给我看了新写的一首七律，写的是：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弱后灰。

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们相对黯然。这就是他后来收在《槐聚诗存》中一九八九年唯一的一首，题目就叫《阅世》。

我相信海内外无论什么样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命运无论作什么样的推测与分析，也不会超出钱先生的卓见以外——“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抗战胜利后五十多年的知识分子，论数量是几十成百倍地增加了，但是，他们的教育总是缺了一些什么。因此，从总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水平而论，似乎总不如三十年代和那时以前的几代。也许是世运如此，但是我只能相信后人总有赶上来的一天。

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钱先生是达人，该想到的当然都想到了，不过他唯一的女儿阿元，钱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还常来侍奉汤药的，却竟因为骨癌而先他两年去世，还不到六十岁。钱先生心里应该不能无伤痛。然而修短寿夭，终期于尽。谁又能逃得脱这条规律呢？

写到这里，有人打电话告诉我，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听到钱先生的噩耗后，纷纷折纸鹤来追悼他们的老学长，给钟书先生送行。石在，火是不会灭的。知识的生命不熄，钱先生也就可以无憾了。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钱先生逝后第五日）

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

——追念我的老师钱钟书先生

朱锡沅

虽然已知我的老师钱钟书默存先生以耄耋高寿而又卧病有年，但当中央电视台1月20日报道先生逝世消息时，我这个年届古稀的人仍忍不住悲从中来，泪下酸鼻。“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先生61年前所写石遗先生挽诗中的这两句，正好表达了我此时的心情。先生的逝世，不仅对我来说是痛失一位良师，而且，对民族乃至世界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我早在无锡读中学时，就读过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和《围城》。那是受我叔父朱南铎（1916—1970，笔名一粟，已故红学家）的影响。我叔父在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时，旁听过先生的讲课，盛赞先生的才学识见。后来他回到家乡无锡，每见先生有著作问世，必购置案头，先睹为快。我在一旁也就成了先生的一名忠实读者。1947年夏我考入上海闸北宝山路的暨南大学外文系，知先生在系里任教，但教的是高年级学生，不敢贸然前去旁听。某日，侦得先生有课而我恰好无课，就急奔三楼由教室玻璃窗外窥看先生讲课，得以一睹先生风采，稍慰仰慕向往之心。1949年5月解放大军包围上海，学校停课疏散到市区中心。我也避居在陕西北路一亲戚家。某日，尝试着给先生写信，寄开明书店请求转交。想不到不日即得先生示复，约去长乐路先生寓所相见。我喜出望外，如期赴约，晤谈甚欢。不久上海解放，同学们纷纷离校参加革命工作，我

则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三年级转学生。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见到《大公报》报道先生夫妇应聘北上清华大学任教的消息，所以我一到清华园办好一切入学手续，当夜就找到工字厅先生临时住所前去拜访。异地重逢，先生惊喜之余，殷殷款待，使我这个远离家乡的青年学生倍感亲切。

我修读先生所授的课是《世界文学史》，这门课大三、大四一起上，人数本来已多，加上外系学生包括理工两学院前来旁听，常常弄得座无虚席。有室后站立者，也有自带坐凳者。这种盛况，在解放后的清华园也不多见。先生讲课，古今中外，滔滔不绝，渊博的知识，精辟的见解，使学生大开眼界，而且自始至终使用流利的英语，只在引用我国文献时才插入几句汉语。每堂课如能全部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好文章。有一次先生讲授古希腊文学，讲到荷马史诗之后出现的一位叙事诗入赫西俄德及其长诗《工作与时日》，忽然话锋一转说道：“使我惊奇的是，你们学生中居然有人读过这一作品。”学生们扫视左右，不知先生所指是谁。及见先生莞尔目我，我亦点头微笑，群疑顿释。原来数日前，我曾与先生谈及在上海暨南大学图书馆读过这一作品的英文译本，对其朴实风格颇感喜爱。此后，同学们渐知先生与我有同乡之谊，关系又较接近，有人想拜访先生，往往请我引见。有一次，我陪高我一级的两位学生去看先生。大家高谈阔论，我则旁坐聆听，发言不多。次日即得先生信说：“昨日之会，何锡员竟成金人耶？”我知道这是先生在打趣我，因为我学名朱锡沅（因是无锡人，才取笔名朱沅），沅、员同音。当然，我在人多场合，惯于“三缄其口学金人”的性格特点，又岂能逃脱先生那双观察入微的眼睛？

当时我写了一首题为《偕同学诸君谒默存师于清华园南院》的七律，请先生指教（注一），先生对全诗未加评论，只指着第三、第四两句说：“这句出自陆游‘国家科第与风汉，天下英雄唯使君’；这句出自刘禹锡‘旧人惟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我说：“正是！

正是！”先生接着说：“后人做诗好比做贼，往往窃取前人诗意词句，为己所用。当然手法拙劣巧妙，各有不同：有原封不动者，有改头换面者，有反用其意者，有点铁成金者……”。先生还举例说明，说罢哈哈大笑。只此一例，即可见先生博览强记，见地精辟、深刻、新颖，再加上诙谐幽默，妙语如珠，使人如入宝山，决不空手而回。

《世界文学史》两学期讲授结束，先生要求学生每人写一读书报告以代替期终考试。我以读意大利大诗人但丁作品为题写了一篇报告，报告中对先生《写在人生边上·谈笑》文所谈故实有所补充。（注二）先生阅卷后对我赞许有加，给了我一个90高分。当时我曾妄想毕业后考研究生，从先生治比较文学，曾将此意向先生叩问。先生说，计划只招收一名研究生，而且只搞英语语法。时已偏重实用，都薄纯学术，少年梦想，遂告破灭。

1950年暑假，我回无锡惠山省亲。先生写信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钱基博子泉老先生。我去无锡城中七尺场钱氏老宅拜访从湖北回乡消夏的钱老先生时口占一绝，作为见而之礼（注三）。钱老先生大喜，当即将铅印大作一套签名赠我。我把它藏在惠山老家书橱中。后来十年浩劫，老家被抄，住房鸠占，这套赠品也被殃及，不知所终，十分可惜。

1950年冬，我在着手写毕业论文之前，有一点空闲时间。其时我知先生能诗，但从未读过先生诗作，于是就大胆向先生提出一读先生诗稿的要求。先生慨然应允，取出一本手写的《中书君诗存》借给我看。我大喜过望，如获至宝，在图书馆阅览室里花了好几个晚上反复读了好几遍，还做了一些摘录，什袭珍藏起来。几年前喜见先生《槐聚诗存》出版，发现有一些改动，还有不少我认为写得不错的篇什，均已删弃不存。可见先生对自己标准之高，要求之严；举凡问世之作，必是精益求精的精品。

记得当年闲谈中，先生还曾提及解放前夕牛津大学邀请先生前去讲授《庄子》一事，先生说，自己终于未去。是什么原因？先生

未说，我也未问。我当时想过，至今仍然认为，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先生怀有几代爱国知识分子都怀有的一颗“中国心”。先生自己在1938年巴黎时所作《将归》一诗中就深情地说过：“难酬终古是春晖”。这春晖，指母亲，也指父亲之邦，母亲的土地（motherland），生我养我的祖国。怀有此心之人，离去了要回来，回来了不愿离去；耿耿此心，眷眷此情，患难与共，生死不渝！

1951年夏，我大学毕业，当即服从建国后第一届统一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参加革命工作，按照现实需要，做政治理论刊物的编辑。1953年在乌兰浩特，同事中有金启先同志，时任文艺处长（后任内蒙古日报副总编辑），是蒙古族中老一辈知识分子，他见我书架上有先生所著《谈艺录》一书，慕名借去阅读，经月始还。由此知先生芳声远播，虽穷边绝塞，兄弟民族中也自有读者在。1956年在呼和浩特，先生同事、民间文学专家孙剑冰同志来内蒙古采风，给我带来先生问好的口信。先生垂念眷顾之情，使我既感且愧。

三年前，我曾给先生写信，想请先生为我叔父遗著《问神室诗稿》作序，中有“敢乞玄晏一言，为三都增重”（用西晋皇甫谧为左思名赋作序事）之语。信由栾贵明同志代复，知先生已卧病，而且“大概已不可能再写什么了”。我北望京华，怅然良久，只有默默为先生祝福而已。

今先生竟然走了，先生走得从容，走得简单平常。世上有许多事本来是很简单很平常的。被人们搞得不简单不平常了。久而久之，人们反以这不简单不平常为简单平常了。先生敢违流俗，一反其道，自行其是，还事物本来面目，甚至连自己的骨灰也不教留。但先生留下了所写的书，它们将永留天地间，成为宝贵的民族和世界文化遗产。记得先生送胡乔木同志的挽联有一句说到自己“酬知酬愿愧我一无成”。这是先生自谦之词，其实先生知愿两酬，成就卓越辉煌。先生可以无憾矣！先生真不朽矣！

我回首往事，如尘如梦，点点滴滴，缀成此文，只不过是想在

先生人生边上添加微末且拙劣的一笔，以寄托区区对先生的无限追思。至于先生一生志行学问，当世已有专学，又有公论，就不用我赘言了。

一九九九年元月十九日先生下世后一个月于苏州

（注一）这首七律的全文是：“夙子当年尽折腰，关山行遍仍缁袍。已无科第与风汉，岂有何戡唱雨朝？饼虽下咽还负气，字将没迹旧题桥。多情莫问春归处，布谷声中柳絮高”。

（注二）先生在《谈笑》一文中说，用笑来区分人兽好象拉伯莱（法国作家）是第一人，并引用拉氏《巨人世家》中一段话来说明笑是人类的特性。关于笑的这个看法但丁在《新生》一诗中早就说过。《新生》第25节说：“……我又说他在微笑，也说起他在谈话；这些看来都是人的属性，特别是微笑。因此，我似乎把他看作是人了。”（这里“他”指爱神，见钱鸿嘉评但丁著《新生》第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笔者。）

（注三）这首七绝的全文是：“久仰君王射大潮，十年磨剑只儿曹，而今浮海来蓬岛，要学水仙一曲高。”在此之前的1946年春，我在无锡辅仁中学读书。国文老师李康复先生曾邀请钱老先生来校演讲，并指派我上台做记录。钱老先生讲的大概是关于国学方面的问题，具体内容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

暨南听钱钟书先生课追忆

章学良

钱钟书先生是在1946年由暨南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刘大杰先生邀请到暨南担任教授的。我是在这一年的秋天，通过转学考试，到暨大法律系二年级读书的。第一学年读的课程较多，学习紧张。第二学年修的学分减少，课后有点时间，可以到别的院系听名教授讲课。我早就从我五叔章鹏若（暨南大学经济学教授）口中知道钱先生学贯中西了。他在暨大教书，当然不会放弃听他讲课的极好机会。

我听钱先生的课，是在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听课地点在宝山路暨大文法学院（二院）东大楼下第三教室里边的一个小教室——第四教室里，一进门就是黑板和讲台，为了避免与第三教室的声浪冲突，所以上课时，教室门总是紧闭的。教室南面是一排明亮的玻璃窗。听课的同学约20余人，都是外文系高年級的，我是唯一的别系的旁听生。

钱先生讲授“西洋名著选读”从荷马史诗开始，我已是中途插入，听的是十八世纪英国著名剧作家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30—1774）的小说《威克斐牧师传》；还曾听奥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的《傲慢与偏见》。

当时钱先生三十七八岁，风华正茂。他常穿一套深棕色的条花呢西装，面色白润，头发漆亮，前额宽阔，戴一副黑边眼镜，目光炯炯，一口清脆的牛津英语，两手常常倚在讲台上，滔滔不绝，边讲边板书。他既深刻地分析作品，尤善于发挥联想，每当他抓住一个话题时，便溯源穷流，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贯通中西，纵横对

比，庄谐间出，如万斛泉，随地涌起。非常可惜，当年的听课笔记，在“文革”期间，都已成为劫灰。但是直到现在，他讲“良心是懦夫”（哈姆莱脱“独白语”）和“绿毛乌龟”“绿帽子”等等时的情景，犹历历如在目前，他大量引证了英、法等西方名作中的书证，也偶尔联系中国“绿头巾”的故事，下至稗官戏曲中的一些例子。讲前者时，神情严肃，侃侃而谈；讲后者时，又幽默诙谐，妙趣横生。

在课外，我也常常见到钱先生，或者在课间，或许是为了等候学校接送教授回家的吉普车，他总是一个人独坐在东楼楼上大教室走廊北面的木窗台上，手中捧着厚厚的、重重的原版书，（有时在身旁还有一大叠，大概是刚从图书室借出来的吧！）孜孜不倦，旁若无人，看得是那么入神，在两年里，我从没有见到他去教授休息室喝茶休息，谈天说地。1948年10月，我因当选为1949年届级会理事，任编写毕业纪念刊的主编，还要撰写毕业论文《西方法学思想述评》，再也抽不出时间听钱先生的课了。但是，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每星期仍然能见到钱先生，他一如既往，常在课间或授课完毕以后，独自一人坐在东大楼楼上走廊北面的木窗台上，读他厚厚的原版书。

钱先生究竟在读什么书啊？几十年来，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直到前几年读了杨绛先生的文章，和邹文海先生在台湾写的《忆钱钟书》，才豁然解开这个“谜”。杨先生写道：“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繁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他看书常做些笔记。”（杨绛《将饮茶》132页，或《杨绛作品集》第二卷149页。）邹文海先生写得更为有趣。1939年11月，他与钱先生结伴同去湖南时，“日夕相共者几近一月”，途中交通梗阻，步步艰难，“心境愈来愈恶劣，真是懒得动弹了”，但“钟书君依旧怡然自得，手不释卷，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